

王乙康： 未来经委会将确保 人人受益于我国经济增长



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右二）说，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由人力资源来主导。他也勾勒出未来经济委员会建议涵盖的四大环节。参与未来经济国际圆桌会议的还有新科大董事会主席李子扬（右起）、公务员首长兼总理公署（战略）常任秘书王文辉，以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等。（周柏荣摄）

叶伟强 报道
yapwq@sph.com.sg

未来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不仅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继续蓬勃发展，关键在于确保增长具包容性，让每个国人都能从中受益。

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昨天在未来经济国际圆桌会议上，针对即将公布的未来经济委员会建议报告书，表达政府的立场。

王乙康说，尽管新加坡继续对外开放，包括吸纳人才，但我国的增长不能再由人力资源来主导，而是通过优化的资源配置，以提高生产力、创新和精深技能来带动经济增长。

他说：“政府成立未来经济委员会，以及之前其他经济检讨委员会的目的，在于确保经济增长具包容性，而不是为了让精英分子有很好的发展，因为这些精英可以照顾好自己。

“我们必须清楚自身的强项，知道如何取得最大程度的成功，并提高技能水平、把点子带入全球市场、培养创业精神文化，这样才能确保所有人，包括成熟及面对风险的员工，乃至未来几代的新加坡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我们必须清楚自身的强项，知道如何取得最大程度的成功，并提高技能水平、把点子带入全球市场、培养创业精神文化，这样才能确保所有人，包括成熟及面对风险的员工，乃至未来几代的新加坡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教育部长
（高等教育及技能）兼
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

生产力的提升和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王乙康说，这四大方面是清楚自己所占的优势以寻找增长的契机、让国人的技能更为精深、国际化，以及培养创业精神的文化。

“我们必须找出外在需求以后可能增加，我国又相对占优势的领域……精深技能让每个员工能更好、更有竞争力地完成工作……通过区域和全球市场，并拥有一个扩展式的思维和国际观才能抓紧契机……国人也应该做好往外发展的准备……而精深技能和往外发展的欲望将成为创业精神的基础。”

他举例，当初政府建造裕廊岛以发展石油化工业时，受益的不只是在岛上工作的员工，物流和供应链领域的中小企业，以及建筑和维修公司等辅助工业都因此应运而生，为国人创造数千份工作。

未来经济委员会 建议有四大方面

王乙康说：“未来增长的领域也会有类似的效应。（例如）你无需是程序编写员才能从我国推动的数据经济中受益。我走访选区时曾遇到一名讲福建话的中年男子，他说他在谷歌工作，但他看起来不像编码员。我进一步询问才发现原来他在谷歌的员工餐馆工作，还负责带领一组员工。这就是数据经济和其他增长领域创造就业机会的例子。这就是具包容性的增长。”

未来经济委员会的建议将通过四大方面，确保新加坡能以“更少的资源，做得更多”，通过

政府可助打造创业环境 社会可赞颂成功

要培养推崇创业精神的文化，王乙康认为政府可以协助打造一个有助于创业的环境，而社会可扮演的角色更大，包括社会如何看待失败、赞颂成功，以及决定要向什么样的人致以敬意。

王乙康强调：“在我国下个阶段的增长，创业和创新必须成为我们赞颂的文化。就如我们今天向学术成绩优秀的人致以敬意一样，我们必须向企业家致以敬意。我在当今学子看到这股精神，但每次与他们对话时，他们都会问，要如何劝导父母支持他们的所作所为？文化观念上的改变必须意味着，整个社会，包括家长，必须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再次成为拓荒者。”

这个为期两天的圆桌会议由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在丽晶酒店举办。

相关新闻刊第4页

未来经济国际圆桌会议 王乙康答问录

昨天举行的未来经济国际圆桌会议，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在约半小时的问与答环节中，回应多名海内外与会者的踊跃提问。与会者就我国经济发展的多个课题提问，以下为其中四题的摘要。

问：关于美国近期的发展，新加坡是否有能力应对？如果贸易市场封闭起来，将如何影响我国及整个亚洲？

答：我记得新美自由贸易协定当初进行谈判时，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劳工与环境的议题上有所顾虑，因此我们遇到强大的阻力，但我们最终谈妥这些问题，而如今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与劳工和环境有关的章节已成常态，就因为我们消除了其中的顾虑，因此也化解了阻力，贸易协定才能取得进展。

我认为阻力和进展是并存的，我们目前不处于须选择单一思想的交叉口。其实，我们已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只是因为有些许顾虑存在而引来阻力。……我不认为美国能完全自我封闭，美国的经济是由发明与专利、人口的流动，以及在各国的投资所驱动的。他们的军队还是会到有投资的地方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世界仍会继续全球化，只是我们必须解决一些问题。

问：新加坡政府如何检讨（政策上的）失败？政府又如何从失败中学习？

答：在新加坡51年的历史中，政府在一些政策上是有失误的，但每次都很快地自我纠正。但那是过去，如今新科技带来更多可能性，而好的政府肯定会对新科技加以管制。但若管制过多，科技能带来的可能性就不会发生，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但那也是最笨的做法。

政府因此应有更敢于冒险的文化。……但（敢于冒险）难免会带来所谓的“失败”，因此政府也应更宽容，这是在今科技进步的时代必须做到

的。……我认为，我们将来必须培养一批曾经历失败的公共服务领袖。他们勇于冒险，也做出新尝试，最终取得成功。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们应该可为下一代当更好的领袖。

问：要从小培养创业精神，教育制度应有何改变？

答：创业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或许我们并未真正去发挥它。

在学校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淡化对学业成绩的重视。学业成绩能让我们评估学生的学习进度，也能在升学时作为筛选学生的标准。但时间久了，我们却把重点放在成绩的筛选功能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再次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主要以成绩来鉴定学生是否已掌握应学的知识。……但最终是否能改变这种（重视学业成绩的）风气还在于家长，我希望家长能响应政府的号召，改变他们的观念。

问：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向是我国的经济策略，而政府的体制与机构也是按此而设。如今，旧制的政府机构能否有效施行新的政策？

答：关键在于如何去施行（新政策）。若有任何政府机构必须改组，我们将会那么做，以顺应新的大环境。例如教育部首次设了两个部长，一个负责学校，另一个负责高等教育与技能……管制信息科技领域的机构分为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和政府科技局（GovTech）。

将来或许会有更多这些改组。未来经济报告不会探讨这些细节，但我认为大方向已非常明确。